

# 美、蘇、中共關係縱橫談

尹慶耀

## 一

關於華盛頓、莫斯科和北平的錯綜關係，過去曾寫過一些文章，但總覺得尚有未盡之意。值茲美國與中共業已建交的今日，越發須要從另一個角度，對此問題再作一番檢討，這是本文的寫作動機。文中一些不成熟的見解，尚待賢達指教。

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常常和它的軍事戰略有關。杜魯門時期的美國，曾經由國務院與國防部成立聯合委員會，協調國防與外交政策。共黨政權的軍事戰略、對外政策和革命策略，更是三位一體，密切而不可分。其決定權則掌握在共黨中央政治局。各個國家中這些因素的演變，就影響到彼此關係的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與盟國共同作戰，且於一九四三年解散第三國際，表示它不再支持世界革命，而各國共黨也可表示它與莫斯科無關。這雖然只是一種障眼法，却引發了西方的理想主義，不少人認為這次大戰是最後的戰爭，戰後蘇聯仍可與西方合作。於是，一則要求軸心國無條件投降，澈底解除其武裝，迄今日本憲法還不准有國防軍；二則戰爭一結束，就立即復員；三則竭力想把各國共黨拉離蘇聯，更有意把毛澤東渲染成東方的狄托。美、蘇、中共的三角關係，就是在此一情勢下開始的。另一方面，美國雖有過一段獨霸核武器的時期，却不會利用它來為西方爭得較佳的政治利益。

戰後蘇聯的擴張行動，很快就粉碎了理想主義的迷夢，一九四七年杜魯門主義的宣布，一九四九年北大西洋公約的簽署，就是這項覺醒的象徵。當時美國的國防戰略着重在全面戰爭的構想，核武器祇用作「嚇阻」工具。杜魯門主義重在「圍堵」(Containment)，認為只要能阻遏蘇聯的擴張，它不久就將逐漸自行喪失其擴張的衝力。

一九四八年蘇聯封鎖柏林交通，西方雖以大空運予以突破，但也顯示其沒有在地面上與蘇聯對抗的決心，而北大西洋公約的成立，更表示美國嚇阻的重心在歐洲。當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宣布向蘇聯「一邊倒」且攬得中國大陸後，蘇聯會將擴張箭頭移指向遠東，是不足為奇的。

一九五〇年四月，美國務院與國防部的聯合委員會，提出編號為NSC六十八號的報告書，對局部戰爭的危險提出警告，要求美國增強國防力量。同年六月韓戰爆發，中共於十月參戰，美國將中共拉離蘇聯的幻想至此終告破滅。此時東西兩大集團或由與共產兩大陣營嚴整對立，美國的圍堵政策也就擴及中共。

在韓戰爆發當時，蘇聯已是一個核子國家，以美國爲首的聯合國軍，限制空軍飛越鴨綠江，甚至撤換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演出陣前易帥的一幕。其動機是避免戰爭擴大，更避免引發核戰。這象徵了美國文人戰略家正逐漸抬頭，軍事指揮官受到政治的牽制，有限戰略在形成中。另一方面，史達林的武裝擴張政策受到挫折，但由於戰爭的「有限」，使得中共自以爲其「人民戰爭」可以大行其道。此後，中共之大事支援北越但不希望越戰規模迅速擴大，或即與此有關。

## 一

競選期間曾以結束韓戰爲號召的艾森豪（D. D. Eisenhower），於一九五三年入主白宮。史達林於同年三月五日死亡，克宮各派勢力正準備展開權力鬭爭時，對外需要和平，而中共也願早日卸下韓戰那付沉重的擔子，於是七月廿七日韓戰停火協定即告成立。

艾森豪雖曾強調過「解放」政策，其實他所執行的與杜魯門的圍堵政策無異，而各種雙邊的共同防禦協定，各種公約型的區域性共同防衛組織，就構成了圍堵網。在這兩任總統主政期間的另一近似之處，就是以核武器實行嚇阻，同時強調爲了使經濟能健全成長，須要壓低國防預算。當時認爲從長遠觀點看來，較低的國防預算比較高的國防預算，對於國家安全會有更大的貢獻。一九五四年一月杜勒斯（John F. Dulles）在一篇演說中，提出任何局部性的防禦都不能遏制共產世界的人力，所以局部防禦必須要用大量報復來作爲後盾。如果美國維持一種能用「我們自己所選擇的工具和我們自己所選擇的地點上」作立即報復的巨大能力，就足以嚇阻局部性的侵略。這表示美國不必在現場去對抗地面攻擊，而可以攻擊對方的其他戰略目標以爲報復。他的大量報復的戰略支持他「剃刀邊緣」的外交政策，當時確實收到了嚇阻的效果。

另一方面，蘇聯有了核武器，對這種毀滅性武器的使用也非常慎重，這從一九五六年二月蘇共第二十次大會中所提出的「三和」政策<sup>①</sup>，可以體察得出。其時，中共正處於反美統一戰線時期，它主張暴力革命，不同意以「和平共處」爲對外政策總路線<sup>②</sup>，更不同意廿次大會中的反史。反史引起東歐動亂，打擊了蘇聯的地位。周恩來應邀赴東歐收拾善後，提高了中共的聲望，也啓迪了毛澤東爭奪世界革命領導權的野心。

一九五七年十月蘇聯將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斯潑特尼克」（Sputnik旅伴）射入太空，這使美國的蓋瑟委員會（Gaither Committee）向總統和國家安全會議提出的報告中，首次發出「飛彈差距」（Missile Gap）的警告。此時蘇聯的地位又陡然提

註① 指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第廿次大會中經已提出，至一九六一年十月第廿二次大會時，「三和兩全（全國家、全民黨）」政策即已完成。

註② 中共的「和平共處」政策下，附有「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它反對以和平共處作爲無產階級對外政策總路線。即反對與帝國主義和平共處，而主張將帝國主義的代表——美國予以孤立。

高，於是黑魯曉夫乘蘇聯革命紀念四十週年（十一月七日）慶典時各國共黨代表團齊集莫斯科之便，召開第一次世界共黨會議，企圖重振蘇共在世界革命中的一元領導地位。

毛澤東親自率團參加了這次會議，他曾擬藉蘇聯的核武器嚇阻美國，掩護他在亞、非、拉丁美洲以「人民戰爭」進行武裝革命。這從他在會中發表「死一半人還剩一半人」的核戰理論，和在那次會議發表的「宣言」中，由中共主張寫上「以蘇聯為首」字樣等等，可以領悟其真意所在。然而，他的戰略未被接受，中蘇共黨且為此發生了爭執。

「飛彈差距」意味着蘇聯不僅在太空技術上，且在軍事能力方面也佔了優勢，事實上後一優勢並不存在<sup>⑥</sup>。蘇聯自己當然知之甚稔，因此它不能答應中共的上述構想。另一方面，蘇聯內部的軍事思想正在發生激烈爭論，革新派主張全力發展核武器，傳統派自然重視傳統武力，而折衷派則主張二者不可偏廢。由於黑魯曉夫本人的支持，革新派佔有優勢。這一派人士認為未來的戰爭必然是核大戰，它具有全面性、短期性、毀滅性，因此一方面要集中力量發展這種武器，另一方面要避免觸發此項戰爭，以免自己和敵人同歸於盡。即使是局部戰爭也應該避免，否則它仍有擴大為全面核戰的可能。

一九五八年毛澤東發動「八·二三砲戰」，一方面是轉移「人民公社」失敗後大陸人民的視線，一方面也是試驗和中共有軍事同盟條約的蘇聯的態度。黑魯曉夫顯然是認為毛澤東有意和他的和平攻勢搗蛋，他只在砲戰結尾時向美國提出警告。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達賴喇嘛出走印度，四月三日印度通知中共，謂將庇護達賴，中共立即抨擊印度，並以軍事行動相恫嚇。六月廿日蘇聯單方面撕毀它和中共於一九五七年十月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拒絕向中共提供原子彈樣品及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九月十五日黑魯曉夫訪美，和艾森豪創造大衛營精神。另一方面，中共和蘇聯的對外策略就愈加分歧。

### 三

核戰雙方同歸於盡的想法，在美國同樣流行。當時一般假定美蘇之間的戰略平衡具有內在的穩定性。直到「研究發展社」（RAND Corporation）的烏爾斯特（Albert Wollstetter）在「外交季刊」一九五九年一月號中發表「微妙的恐怖平衡」一文，才引起戰略思想的重大改革。其要點是在敵人的第一擊之後，還要能够保持生存並仍具有報復能力，這樣才能對握有第一擊能力的敵人，建立一種可信的嚇阻。於是，一九六〇年的總統大選中，甘迺迪就對艾森豪政府的國防政策加以攻擊，他不僅提到飛彈差距和嚇阻差距，也指摘美國對於傳統性兵力和空運及海運能力的嚴重忽視。

在蘇聯，它仍舊集中發展戰略武器，於一九六〇年一月宣布成立戰略火箭部隊。同時裁減兵員三分之一（一二〇萬），也減少若干傳統性武器。同年七月八日黑魯曉夫在維也納答覆記者，聲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主張避免局部戰爭。中共於「國防新技術協定」破裂後，聲言自力發展核武器，但當時仍在起步階段，因而再度強調大練民兵，恢復毛澤東的建軍路線。一九六〇年七

註⑥ 甘迺迪（John F. Kennedy）入主白宮後，發現美國正享有壓倒性的戰略優勢。

月蘇聯對中共撤援。「十·一」偽慶時中共一反往例，五〇萬人大遊行以民兵為主，正規軍僅有儀仗隊參加，未舉行閱兵。衆多外賓大部來自亞、非、拉丁美洲。天安門上毛澤東的兩旁，是緬甸總理宇努（U Nu）和阿爾及利亞叛軍首領阿巴斯（Ferhat Abbas）。這無異向世界宣示，中共要以「人民戰爭」方式，在亞、非、拉丁美洲掀起反帝反殖、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的革命。

共黨政權的領導核心不常變動，因而其政策也可有較長時期的持續。一九六一年第一期的蘇共「共產黨人」雜誌上，黑魯曉夫爲文把戰爭分爲三類：全面戰爭是要竭力避免的；局部戰爭既可擴大爲全面戰爭，自然也應避免；只有解放戰爭才應予以支持。這種說法，一則與共黨把戰爭分爲正義的與非正義的之傳統說法有異，二則解放戰爭與局部戰爭在規模上也難嚴格劃分，因而終黑魯曉夫之任期，蘇聯對越戰的態度都比較消極。這使得中共乘機大量援助北越，截至一九六四年十月黑魯曉夫下台前，北越、北韓乃至古巴都親近北平，阿爾巴尼亞更是中共的死黨。

美國總統連續兩任也不過八年，長程計劃較難策定，新的構想容易提出，一九六一年就任的甘迺迪總統就以「新境界」（New Frontier）爲其政策目標。他對外想提高美國在自由世界的領導地位。新任國防部長麥納瑪拉（Robert S. McNamara）認真發展傳統戰力並擴充陸軍兵力，準備應付「兩個半」戰爭。另一方面，甘迺迪上台不久，恰值中國大陸缺糧，他曾公開宣佈，如果中共提出購糧要求，美國將予考慮。對此，中共以謾罵方式拒絕。一九六二年十月美蘇之間有過加勒比海危機，但一九六三年七月美、英、蘇三國局部禁試條約在莫斯科成立。此事被中共認爲是黑魯曉夫與西方妥協，俾集中精力對付中共的舉措。同年十一月十四日甘迺迪聲稱美國「並不堅守敵視紅色中國的政策」。十二月十三日主管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何斯曼在舊金山「美國政策協會」的一篇演說中，聲稱「美國今天對中共的政策，乃是決心保持門戶開放，以待他們態度的轉變」。這乃是對圍堵政策的一項修正態度。

一九六四年一月廿一日「人民日報」以「全世界一切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力量聯合起來」爲題發表社論，抨擊美國「從杜魯門到艾森豪威爾，到甘迺迪，到約翰遜（即詹森），一脈相承地執行美國壟斷集團所制定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企圖實現它征服世界的狂妄野心。現在，它正在加緊使用戰爭與和平的兩手策略來瓦解和消滅社會主義陣營。它正加緊撲滅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主革命鬪爭。正在加緊控制所有的盟國。爲了粉碎美帝國主義稱霸世界的罪惡計劃，全世界人民……必須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加強共同的鬪爭」。二月十九日「人民日報」又刊登「觀察員」文章，對何斯曼的「門戶開放」論，大肆冷嘲熱罵，使得美國第一次向中共招手的嘗試遭到挫敗。

前引一月廿一日「人民日報」社論，提出第一和第二中間地帶的理論，使中共的統戰外交進入「中間地帶論」階段，其目標在反美排蘇。同時，從一九六三年底到一九六四年初，周恩來率領龐大的代表團訪問亞非十餘國家，籌開「沒有白人參加的第二亞非會議」，企圖將美蘇勢力逐出亞非二洲。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廿二日總統遇刺身死，由詹森 (Lyndon B. Johnson) 繼任美國總統。甘迺迪生前決定對越戰作更深的介入，詹森總統時期，越戰就逐步升高。

一九六四年六、七月間，寮、越局勢吃緊，黑魯曉夫方在北歐旅行。同年八月初，北越偷襲美國軍艦而觸發東京灣事件，黑魯曉夫正在伏爾加河流域農村視察，蘇聯對此事件的反應冷漠乏力。五日蘇聯駐聯合國代表支持美國建議，擬邀北越代表出席安理會作證，但被中共及北越以謾罵方式峻拒。

由於國內經濟問題以及蘇聯在共黨世界中領導地位的低落，加以預定於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三次共會議預備會議，被邀請的廿六國共黨（連同蘇共）中，覆函接受者十一個，通告缺席或未答覆者十四個，會議不能如期召開，使蘇共無法交代，於是，黑魯曉夫於十月十五日被迫下台。十六日「塔斯社」發表此項消息，當日下午中共就試爆了它第一顆原子彈，進入核子俱樂部。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至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中共連續發表了「九評」，使它和莫斯科的理論鬭爭達到最高潮。黑魯曉夫垮台後，中共對蘇抨擊突然暫趨緩和，十一月間周恩來率團參加蘇聯革命紀念慶典，圖謀與蘇聯言歸於好，但布里茲涅夫當面告訴他，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上，在「對待中國」的問題上，他們同黑魯曉夫「沒有一絲一毫的差別」④。周恩來鍛羽而歸，中共和莫斯科的衝突轉烈。但中共籌開第二次亞非會議、反美排蘇的努力並未成功，會議流產，中共也開始與亞非國家發生齟齬。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共發表「駁蘇共新領導的所謂『聯合行動』」一文，聲言它與蘇聯「在當代一切根本問題上針鋒相對，有互相分開的東西，沒有聯合起來的東西，有對立的東西，沒有共同的東西」，彼此要「劃清界限」。中共和蘇聯是分裂了，自由世界將如何因應呢？

第一是把敵方陣營的分裂，認為是自己政策的成功，是美國和蘇聯的交往與談判的結果；第二是又不很高明地想加以利用。一九六六年三月八日美參院外委會就在傅爾布萊特 (J. William Fulbright) 的主持下，邀請「中國問題」專家，展開對中共政策的大辯論。政府要員包括詹森總統在內，都發表過緩和美國和中共關係的言論。同月十六日國務卿魯斯克 (Dean Rusk) 在外委會的證詞中，也提出：重新保證不進攻中國大陸；擴大非官方接觸；同北平坐下來談商裁軍和不擴散武器等重要問題的意見。而麥納瑪拉則於五月十八日在美國報紙編輯協會集會中，提出向中共「搭橋」之議；第三是因敵方分裂而鬆弛警惕，進而己方也鬧彘，戴高樂之與蘇聯勾搭，一九六四年一月法國與中共建交，以及此後一九六七年法國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防禦結構，就正是這種表現，且與日後所謂多元外交的理論，也不無關聯。

註④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聯合文章「駁蘇共新領導的所謂『聯合行動』」中所透露。

就軍事力量與戰略而言，早在五〇年代美國國內對杜勒斯的大量報復政策就多所批評，鮑爾斯 (Chester Bowles)、艾契遜 (Dean G. Acheson)、考夫曼 (William Kaufman) 和季辛吉 (Henry Kissinger) 等，都認為大量報復主義對於局部性、模糊性的共黨行動，並不能發揮有效的嚇阻作用。而且，若把大量報復當作一種行動政策而付諸實施，對美國而言，其結果將無異於自殺。所以他們主張在歐洲以外的地區，也必須要有一種局部戰爭的戰略。此後，到五〇年代後期和六〇年代前期，美國人又開始感到歐洲也需要一種直接防禦的戰略。這些觀念與「彈性反應」(Flexible Response) 和甘迺迪時代「兩個半」戰爭等等有其關係。當詹森總統決定派遣大軍赴越南時，兵力和裝備都已是現成可用的，而北約組織的戰略也依照「彈性反應」觀念加以修改，以便應付傳統性戰爭的可能性。

儘管如此，由於麥納瑪拉的國防部對文職顧問的倚重遠過於軍人，又由於一九五七年即已獲承認的有限戰爭戰略的影響，在越作戰的美軍處處受到牽掣，遭受到多少不應有的損失，甚至受到共黨毒品攻勢的威脅，但正如魏摩蘭 (William C. Westmoreland) 將軍所說，美國在越南軍事上並未戰敗，而是在政治與心理上被擊敗<sup>⑥</sup>。這等於是說，擊敗美國的不是一九六八年越共的春節攻勢，而是一九六八至六九年美國國內的反越戰運動。事實確是如此。

在蘇聯方面，布、柯上台後，國內軍事思想爭論漸近尾聲，大多數人認為未來的戰爭，可以是核大戰，也可以不是；局部戰爭可以擴展為全面戰爭，也可以仍限制在局部。從一九六六年起逐年增加國防預算，全面發展各式武器。它對支持解放式局部戰爭，不像過去那樣多所顧忌，也就逐漸從中共手裏搶去了北越乃至北韓。另一方面蘇聯雖然不曾放棄和平共處的口號，但在經濟競賽方面却因制度不良而告失敗，一九六六年三月的第廿三次大會中，經濟改革的呼聲就蓋過了競賽的口號。可是蘇聯的官僚主義、公有制度，都妨碍改革的進行，軍事費用的負擔也對改革不利，而東歐的經濟改革，則引發了民主化與自由化的運動，以致一九六八年八月，蘇聯不得不率五國軍隊進入捷克，壓服了捷克的自由化運動，但也震驚了世界，促進了國際形勢的劇變。

中共自一九六六年掀起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七年開始造反奪權，實施造反外交，除了黃華一人在開羅外，所有駐外的高級外交官，悉數調回大陸參加文革。它和大多數共黨國家發生齟齬，若干亞非國家與中共斷交或凍結外交關係。是捷克事件，使毛澤東從夢中驚醒，才急速結束造反，在各地成立革命委員會，於一九六九年四月召開「九大」，策定「三反」的對外路線，一方面恢復外派「大使」，以期脫出國際孤立。

詹森總統原有訪蘇之議，因捷克事件作罷。而於一九六八年競選總統的尼克森，則強調要拉攏中共。

一九六九年一月尼克森總統就職演說中，提出「談判時代」的口號，但那一年却是中共和蘇聯軍事衝突的高潮期。從三月二日的珍寶島到八月間的新疆裕民縣，武裝鬭爭正在升級。據美國資料透露，這一年的春夏之交蘇聯在中蘇邊境迅速增兵，以最後

註⑥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魏摩蘭在倫敦美僑商會午餐會中的演說。美聯社倫敦電，聯合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第四版。

通牒限中共於八月十三日至遲九月十三日開始同蘇聯「協商」，否則就進攻大陸，摧毀中共的核子設施。由於美國的秘密警告，使蘇聯受到影響而未成事實<sup>⑥</sup>。此說或許並非空穴來風，因為同年十月七日中共政權發表的聲明中，曾經聲言：「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中國絕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如果一小撮戰爭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襲擊中國的戰略要地，那就是戰爭，那就是侵略，七億中國人民就要奮起抵抗，用革命戰爭消滅侵略戰爭」。

同年十月廿日中共和蘇聯在北平開始副部長級的邊界談判。一九七〇年一月廿日中共和美國恢復華沙會談，這些都是「重慶談判」式的「針鋒相對」的鬭爭。此後，中共和蘇聯之間，就進入外交鬭爭階段。

## 五

在一九六八年競選時期，尼克森曾主張應重建美國的戰略優勢。他上任後恢復了國家安全會議的地位。這個會議對戰略問題作了一番檢討之後，認為蘇聯具有對抗的能力，所以優勢的維持已不再有可能，遂決定不再大量增加美國戰略性兵力，且相信如此作法不會鼓勵蘇聯去尋求核子優勢。當時美國的口號是「核子充足」(Nuclear Sufficiency)，且警告說，倘若蘇聯對戰略兵力繼續增建不停(自一九六五年開始)，則美國將考慮擴大其本身的計劃。美國在檢討其戰略計劃的同時，又與蘇聯於一九六九年開始展開限制戰略武器的談判(SALT)，想要結束核子軍備的競賽。

一九六九年在關島宣布的「尼克森主義」(Nixon Doctrine)，表示美國認為其兵力不應用來應付顛覆活動或游擊戰，那麼由當地政府的軍事力量去應付，美國只應從旁協助。對於傳統性威脅，美國也應以依賴局部性兵力為主。一九七〇年尼克森的國情咨文中，即明白宣布今後所採取的是「一個半」戰爭的戰略。換言之，美國的傳統兵力以能應付一個主力攻擊，並協助同盟國對抗局部威脅為限度<sup>⑦</sup>。

尼克森主義的對外政策有三大支柱，即：實力地位，夥伴關係，和以談判代替對抗。他的白宮特別助理此後又任國務卿的季辛吉的基本構想，是在變革世界中，經由戰略與外交的改變及配合運用，一方面使軍事停留在兩元狀態下，一方面發揮多元世界的創造性，以建立新的國際秩序。

爲了「談判」與「低盪」，尼克森政府會單方面向中共示惠，當一九七一年春中共發動乒乓外交，並經由史諾(Edger Snow)在同年四月三十日出版的「生活」雜誌上發表「同毛澤東的一次交談」，透露中共歡迎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美國反應的熱烈有些超乎常情。七月九日季辛吉秘密訪平，十五日華盛頓與北平(十六日)同時發表尼克森將於一九七二年訪問大陸。一九七一年十月當聯合國對中國代表權問題進行表決時，季辛吉二度訪問中國大陸，客觀上掩護了中共進入聯合國。

註⑥

美國華盛頓大學辛頓教授(Prof. Harold C. Hinton)於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在美國眾議院亞太事務委員會之講詞。截至此處止，本文以上各處散見的美國軍事戰略，請參閱Morton H. Halperin所作「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Military Strategy」，原爲「七十年代國防戰略(Defense Strategies for the Seventies)」一書第四章。

美國如此逢迎中共，一則是希望拉中共去制衡蘇聯，再則是希望中共運用其影響力以結束越戰，使美國能從中南半島「光榮」脫身。但尼季的秘密外交，使日本遭受震撼，北越對中共也不諒解，成爲日後雙方分裂原因之一。尼克森於一九七二年二月訪問大陸，與周恩來發表措詞曖昧的「上海公報」，使今日的卡特政府在與中共「正常化」中墜入圈套。同年五月尼克森訪問莫斯科，與蘇聯簽署第一階段限武協定，在戰略武器的數量上讓蘇聯佔了便宜。西歐則唯恐美蘇直接談判對其不利而嘖有煩言。換言之，對敵人談判美國並未佔到上風，而夥伴關係也並不和諧。

一九七三年一月廿七日巴黎協定成立，越南停了火，不久美國國內爆發了水門案，尼克森終於成爲美國歷史上第一位中途退職的總統。福特繼任後於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與布里茲涅夫在海參崴會晤，關於第二階段限武談判原則性的臨時協議，美國又讓了步。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福特訪平，使美國兩任總統連續訪問一個沒有邦交的國家，而抬高了對方的身價。跟着是北越違約南侵，美國眼看着高棉、南越相繼淪亡而徒呼負負！西貢於一九七五年四月卅日淪陷，它所標誌的是共黨勢力的擴張，蘇聯影響力的加強，美國可恥的失敗。並且間接鼓勵了蘇聯此後積極向外擴張的野心！

本來，在「低盪」聲中，蘇聯、東歐已和西歐各國尤其是西德，分別簽署了若干條約或協定，使戰後的東西歐洲邊界固定了下來。一九七五年七月底，美、加、東西歐洲三十五國在芬京赫爾辛基召開了蘇聯、東歐建議已久的「歐洲安全合作會議」，發表了一項長達三萬餘字的「宣言」（或稱最後文件），這項宣言成爲東西「和解」的象徵，但其內容除了使蘇聯戰後佔領的領土合「法」化，便利其對東歐的控制，使其西疆增高了安全感以外，別無其他意義。

總結截至此時「尼克森主義」執行的結果，美國所表現的是幻想、軟弱、低頭、退讓、不義，而越戰失敗對於美國國內心理上的打擊，長時間難以消除。

## 六

七〇年代的中共統戰外交，已進入反霸統一戰線階段。但自從它與南斯拉夫改善關係並與美國勾搭以後，阿爾巴尼亞就開始與北平不睦，中共強拉赤色越南反蘇却反而迫使河內接近莫斯科。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鄧小平在聯合國第六次特別大會上，公開發表了毛澤東「三個世界」的理論，且宣稱「社會主義陣營已不復存在」，實際顯示它在共產集團已絕對孤立。

按照「三個世界」的理論，中共應團結第三世界、爭取第二世界、孤立第一世界。在第一世界再進行分化，區分主次，聯美制蘇。但中共沒有充足的實力支持它的策略，使它的作爲逐漸與自己的策略相違甚至相反。

蘇聯並未因「低盪」而減緩其擴軍的努力，它的核武器在數量上超過、在技術上正在趕上美國；它的海軍已可威脅到美英的傳統海權；其逆火式轟炸機曾被美國要求列入限武談判對象，這就顯示其空軍力量的不可侮。目前，它有力量執行：(1) 嚇阻全面核戰；(2) 支持左翼勢力；(3) 佔據戰略要地；(4) 掠取重要資源；(5) 控制貿易尤其是運油路線；(6) 蠶食外圍、困擾西方。……這樣一

項全球戰略。

從一九七六年二月蘇共第廿五次大會的資料看來，布里茲涅夫政權的對外政策可稱爲「有限緩和論」，其內容爲：(1)和平共處只適用於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間，也就是對美國和西方先進國家而言，其目的在爭取一個和平建設的環境；(2)和平共處不妨礙國家內部變革與階級鬥爭，也就是說蘇聯仍將支持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3)緩和「物資化」，即希望藉緩和氣氛引進西方的資金、技術，以增益自己的國內經濟。

至於美國的卡特政府，在軍事戰略和對外政策上，並沒有提出一套新鮮、有系統的構想或理論，大部分是因襲「尼克森主義」，在行動上的表現是雜亂無章。它對蘇聯的態度比較強硬，但並不能貫徹到底。第二階段限武談判曾有過較長時期的僵持，但正如前詹森政府國防部副部長及尼克森政府時期限武談判代表尼茲 (Paul Nitze) 所說：目前美國唯一保有原先談判的目標，是達成蘇聯頭目與美國參議院均可接受的條約，「其餘目標都已放棄」<sup>⑧</sup>。卡特政府也提出過人權外交的原則，其結果在若干盟邦引起不快、逼使衣索比亞投向蘇聯，最後在與中共建交問題上碰個粉碎，其目的在聯中共以制蘇聯。

以聯一制一爲目的而玩「中共牌」，就美國與日本言最不可解。中共也是玩牌，周恩來指稱蘇聯「聲東擊西」，目的在把蘇聯的軍事壓力引向西歐。中共也挑撥日蘇關係，並希望美蘇間爆發大戰，總想把災禍往旁人頭上推。西歐玩「中共牌」，是希望中共在東方牽制蘇聯的兵力，減少它對西歐的壓力，儘管事實並非如是，至少自己還可言之成理。美國身負北約國家的防衛責任，但又屢次聲言重視亞太安全，不退出亞洲。那麼蘇聯無論把威脅箭頭指向西方或東方，對美而言區別不大。至於日本，一方面叫出等距離或全方位外交，一方面被中共拉入反霸陣營。而且，就算日本也能讓中共把蘇聯的軍事威脅引向中蘇邊界及遠東地區，日本就可高枕無憂？

然而，進入「談判」的七〇年代，不少人都認爲國際爭端的解決是靠外交而非武力，聯中共制蘇聯是縱橫捭闔、彼此制衡，以建立國際均勢。這也正是近年來中共大量派遣代表團四出訪問的主要原因。然而就中共言，統戰外交要獲成就，須有缺一不可的三個條件，即：共同的目標；響亮的口號；充足的實力。中共派出的代表團，不在和對方增進雙邊關係，而在拉對方反霸即反蘇，在全世界一六〇個左右的國家中，建立這樣一個共同目標是很難的。自從一九七一年的東巴（孟加拉）事件、一九七五年的安哥拉事件後，中共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的口號再叫不響。在「三個世界」理論下爭取第二世界，使得反帝、反殖的口號貶了值。在第一世界中又拉一個打一個，則反霸的口號也要打折扣。當然，更嚴重的是，一九七〇年中共對外援助高達一一二、四〇〇萬美元，此後就逐年下跌，一九七六年僅一四、〇〇〇萬美元，而最近前往中國大陸要求援助的外國代表團，類皆空手而還，這對於中共的統戰外交，是極其不利的。

註⑧ 中央社華盛頓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日電，新生報（同月十六日）第四版。



目前，中共在共產集團中絕對孤立，北韓雖稍稍偏向中共，但它一向搖擺不定。中共已對阿爾巴尼亞及越南斷絕援助，與後者且至動武。華國鋒雖於一九七八年八月間訪問羅馬尼亞，但他不能使羅馬尼亞脫離「經互會」和華沙公約，羅仍是蘇聯集團的一員。華某訪羅確曾使克里姆林宮不悅，對羅加以抨擊，而羅馬尼亞亦曾於同年十一月下旬在莫斯科召開的華沙公約政治協商委員會會議中，對：(1)增加軍費以加強華約機構國防力量；(2)使加盟各國間軍事行動的相互調整密切化、高度化；(3)加強並擴大華約聯軍司令部的指揮權等問題，均加反對，致使蘇聯、東歐六國一度召還其駐羅大使。但十二月初在東柏林召開的華約國防部長會議，所發表的聯合公報強調「友好的氣氛」和「相互理解的精神」，以及「維持華約機構的防禦能力」，一般推測此乃羅國已對增加軍事預算妥協的表現。至於南斯拉夫雖經美蘇屢次拉攏，迄今仍維持其中立不結盟路線，自然不會與中共有進一步的勾結。中共在拉丁美洲除蓋亞那、秘魯及智利外，談不到影響力。在非洲的勢力漸為蘇聯和古巴所驅逐，自尚比亞宣布將廢棄使用中共援建的坦尚鐵路後，中共在非的聲望將大受打擊。在東南亞，中共對緬甸、東協國家，都不能作出不支持當地共黨的保證，因而也就不能博取信任。

其實，中共的「僑務辦公室」副主任林修德早已說過：「越南排華向修正主義的泥淖裏越陷越深；阿富汗發生軍事政變，看來也是親蘇軍人搞的；北韓態度仍欠明朗化。亞洲只有尼泊爾仍然保持不變，能够談得上與我們共進退同生患難的，恐怕找不出一兩個。阿爾巴尼亞已熄掉光照歐洲的社會主義明燈。在非洲爲它大力建設坦尚鐵路的坦、尚兩國最近與我們也有了疙瘩，新的關係沒打穩基礎，舊的關係却走的走，翻臉的翻臉，即使不翻臉也臉黑黑」。

依照「三個世界」理論，第三世界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軍，而中共也宣稱自己屬於第三世界，但中共在第三世界的統戰外交在走下坡，目前正在將其活動重心移至第二世界及第一世界中的美國而獲有若干成就，這是有違其自身的理論的。中共藉其反蘇姿態及四個現代化口號，向西方賺取經濟及其他利益。中共已與歐洲共同市場簽署貿易協定，從法國購進兩座核能發電廠，和英、法、西德進行經技合作且獲信用貸款，在英國洽購獵鷹式戰鬥機……。日本經濟界更與中共進行廣泛的經技合作，把中國大陸視爲廣大的市場，甚至是日本蕭條的經濟之一條出路。美國經濟界似乎也受了相當的誘惑。當然，西歐和日本的投資與信貸，距離中共截至一九八五年的八年經濟規劃所需的六、三〇八億美元的投資額還相差霄壤<sup>⑥</sup>，更甬提至二〇〇〇年實現四個現代化之所需了。西方無力提供足夠援款，協助以原始型農業爲基礎的中共經濟現代化，更無力援助中共現有五〇年代裝備的中共軍隊，現代化到足以對抗八〇年代裝備的蘇軍的程度，而且它們是否願意這樣做，也還是問題。但不論如何，中共目前的作法已獲得不少現實利益，也確是事實。至於面對中共如此作法，蘇聯究竟能够容忍到什麼程度，也還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未知數。至少在目前，西歐和日本一樣，是不願與蘇聯加深對立的。

註⑥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九日李先念對日本創價學會代表團長池田大作說話中透露數字。見「日本經濟新聞」(同月廿日)第五面。

蘇聯不會懈怠它在外交方面的努力，從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日（華盛頓與北平宣布尼克森將訪中共之後）的蘇印二十年和平友好合作條約起，蘇聯與外國簽訂的條約，大都帶有軍事性質。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中共與日本簽訂附有反霸條款的「和約」，形式上已把日本拉入反蘇陣營，是中共外交上一項勝利。但是，十一月三日蘇聯與越南簽訂為期廿五年（期滿前雙方如無異議，每次可延長十年）的友好合作條約，其第六條規定「兩國之任何一方成為攻擊對象，或受攻擊威脅時，為確保兩國的和平與安全，應即互相協議，採取適切而有效的手段，以消除此種威脅」。這是軍事同盟條款。同月廿日衣索匹亞臨時執政會議與部長會議主席、革命軍總司令馬里安（Mengistu Haile Mariam）在莫斯科與蘇聯簽訂為期廿年（期滿前一年雙方如無異議，自動延長五年）的友好合作條約，雙方承諾繼續軍事方面的合作。條約第七條則載明兩國遇有威脅和平或破壞國際和平之情事發生時，應立即相互協商以消除威脅或恢復和平。十二月五日，自從四月政變後就一直走親蘇路線的阿富汗，又與蘇聯簽訂了類似蘇越、蘇衣條約那樣長期而帶有軍事性質的條約。至此，中共廿年來的反蘇鬭爭，却使自己身處蘇聯三面包圍中，以致要高叫「亞安體系陰魂未散」了。<sup>⑩</sup>中共於同月十六日與美國同時宣布將於一九七九年元旦建交，俾在心理戰上予以彌補。華盛頓與北平發表的聯合公報中，聲言「雙方不應在亞太地區，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區，尋求統治一國或他國的霸權。兩國都反對任何他國或國家集團，建立此種霸權的努力」。

細看蘇聯所簽新約都具有軍事同盟性質，中共、日本和美國的「反霸統一戰線」，目前還只具備心理戰的意義。蘇聯已把原本不反中共的國家，拉進反中共陣營；中共只能把原本和蘇聯反對的國家拉來反對蘇聯，如此而已！

自從一九七五年的安哥拉事件以來，蘇聯已在非洲大力擴張，雖然是受了美國聯合中共的刺激，和處理中南半島問題無能的鼓勵。一九七八年二、三月間，蘇聯夥同古巴介入衣索匹亞和索馬利亞的軍事衝突，短期內運送了一〇億美元的軍火，派遣萬餘名蘇古軍事人員到非洲之角。五月間再度挑起薩伊事件，六月間進一步插手紅海地區。十二月間伊朗政治危機轉劇，共產黨死灰復燃，誰能保證蘇聯不暗中介入？如今，好望角的航路、紅海的運油路，都已受到蘇聯勢力的威脅。如果它再奪取伊朗、控制波斯灣，聯同阿富汗支持伊朗東部，巴基斯坦西部的俾路支（Baluch）人游擊隊，進而奪取阿拉伯海上古老的天然港口格瓦達（Gwadar）<sup>⑪</sup>。再獲得越南金蘭灣的使用權，那真是自由世界的一大威脅。而這些都是「低盪」時期和聯中共制蘇聯政策下的產品！

卡特政府上台後，以布里辛斯基的三邊取代了季辛吉的三角。但是，日本這一邊是經濟大國、軍事小國，軍事費用難提高到

註⑩ 楊行在香港「文匯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第十一版「新語」欄方塊文章標題。

註⑪ 關於此一問題，請參閱哈里遜（Selig S. Harrison）作「俾路支噩夢——伊朗、巴基斯坦、阿里汗的複雜關係」，原文載「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一九七八年秋季號。

國民總生產(GNP)的一%；西歐這一邊，增加軍費也不容易。只是最近，這兩邊才因蘇聯擴張軍力的威脅增高，而稍稍注意到本身軍力的增強。美國這一邊却似乎正流行着第二次飛彈差距的傳言，認為自己已落在蘇聯之後，於是將一個中共也拉進了「三邊」之內，可是中共又能提供些什麼？

美蘇限武談判拖延了很久，貝爾格萊德會議檢討赫爾辛基宣言的執行情況，蘇聯集團對人權問題毫不讓步，非洲問題進展不多，卡特將賭注下在中東和平問題上；誰知大衛營的協議執行不力，以埃及和約不能如期簽訂，而伊朗問題又趨嚴重，於是他又把賭注移向中共。他在美國歷史上寫下了背棄一個友好的盟邦、撕毀美國防衛條約的第一筆，而且實際上違反議會政治(不理杜爾——史東修正案，未與國會磋商)、民意政治(不理民意測驗結果及輿論動向)等民主原則，違背自己反對秘密外交的初衷。更嚴重的是這種背信棄義的行爲，將失掉盟邦的信賴。以色列已表示它對美國承諾信心的動搖。日本對美國核子傘的評價，恐也將有所改變。在坐視越高淪亡、安哥拉赤化、索馬利亞敗於衣索匹亞而不施以援手，且在與中共建交而接受不利於中華民國的條件之後，中共能信賴它一旦有事，美國會迅速援手？

日本與中共簽訂「和約」，日本輿論或稱之爲亞太地區和平與安定的因素，可是蘇越條約一出現，那項謊言立被戳穿！美國與中共建交消息傳出後，某些輿論又在侈談和平與安全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日本「每日新聞」社論標題，稱美國與中共「正常化」是亞洲的安定力量。事實上，自從日本簽署「和約」後，蘇聯即在遠東增強兵力，化學兵器、SS二〇飛彈已經配備停當，垂直起降飛機用的基輔號航艦傳將東調，海軍曾在日本北方演習，據傳一九七九年春，海參崴附近將配備逆火式轟炸機。這些都不會對亞太安全有益。蘇聯太平洋艦隊由海參崴到金蘭灣(蘇聯極可能取得使用權)，美國海軍由日本基地到菲律賓基地，都以通過臺灣海峽最爲便捷，任何減低臺灣安全度的舉措都是不智的。在這方面，中華民國沒有責任，所有責任豈不應歸諸日本和美國的行動不夠慎重？

日本和中共簽約，美國和中共建交，對世界和平與東西和解，都不會有好處，更將爲亞洲和太平洋地區帶來潛伏的危機！

## 七

綜上所述，似乎可以歸納爲幾點看法以代替結論。

美國是最初獨自佔有核武器的國家，但正如季辛吉所說，要使核武器發揮作用，必須具備：(1)有鉅大的毀滅力，足以懲罰敵人；(2)有使用巨大毀滅力的決心；(3)使敵人相信你有決心。這三個條件中的後兩個，美國是缺少了，因而美國的核武器不會真的嚇阻敵人，却發生了自我嚇阻作用。所以美國的核子戰略，從嚇阻、大量報復、彈性反應、恐怖均勢，再到第二次飛彈差距的擾攘。傳統戰略也從兩個半戰爭、一個半戰爭，到不作地面介入和自韓撤軍。對共黨集團的政策，則由圍堵、搭橋、談判而聯一制一。這裏所標誌的是自貶身價，步步退却！

其實，第一次飛彈差距就是一場虛驚，這第二次飛彈差距是真是偽，尙未可知。蘇聯年年增加國防費用是真，美國不應在此方面怠忽，本身力量充實，嚇阻敵人或構架和平，都可達成，而這是沒有什麼捷徑或廉價品可以代替的。

過去，自由世界認為圍堵可使蘇聯失去擴張的衝力，而蘇聯式獨裁政治具有自我崩壞的因素，圍堵可以促成其加速崩潰。這項判斷，顯然並未言中。而今這聯中共制蘇聯的政策，早已有很多人指出其不可能與其危險性。美國資深外交家也是共黨問題專家肯楠（George Kennan），於一九七四年八月廿日在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作證時，早已指出中共的意識行爲、軍事建制、以及對雙方利益與承諾的性質，都與美國不同，「如果認為在世界事務上中共可成爲美國的合適盟邦或夥伴，那就是一種幻想」<sup>⑩</sup>。這位圍堵政策的設計人之一尙且如此說，而當前的美國政府却仍一成不變、執行到底，其結果將比圍堵政策更爲有害。

過去，美國一度認為經濟的健康成長，較國防力量的增加，對國家安全更爲有利。甚至一度認為應讓蘇聯原本落後的核武裝成長到與美國平衡，減少它的恐懼感，世界才有和平，及今看來，這是何等錯誤！目前又有一種論調，認為蘇聯壓低經濟成長而瘋狂擴軍，此一趨勢最多只能維持到一九八五年，此後軍事力量不僅不能繼續發展，抑且難以維持現狀，那將是蘇聯對外冒險的時機。或許正是受了這種預言式言論的影響，美國才惶惶不可終日地匆忙與中共建交。可是，這種預言究竟準確到如何程度，與中共建交能否解除此項危機，豈不大大值得慎重考慮？

不久前，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有一篇文章，一方面贊成協助中共發展經濟，並有限度增強其軍力，使它能在東方牽制蘇聯大軍不致西移，一方面又像在乞求蘇聯不必過於介意，因爲那是二流和三流國家合作，而蘇聯却是一流強國。這真是失敗主義的表現。其實，美國不願一對一與蘇聯爭高下，却去拉攏一個中共，也仍是失敗主義。依當前形勢看來，多元外交這個名詞已不大恰當，世界似乎又有逐漸形成蘇聯和反蘇兩個集團的趨勢，而後一集團存在着與魔鬼握手的因素，中共如此做會使它失掉（至少在當前）階級立場，在共黨集團與第三個世界中越發孤立；美國爲恐蘇而聯中共，又在中共威逼下背棄盟友，將使它的國際信譽與地位更形低落。這對美國本身乃至全世界，都有害而無益。而這樣的聯合也只能在心理上予蘇聯一些刺激。

卡特曾出示布里茲涅夫的信函，證明克里姆林對美國與中共建交，能予諒解，用來作爲辯護，仍然是缺乏自信的表現。依我們想來，蘇聯最大的容忍度只是限於它們空洞的建交，美國若給予中共更多的經技或軍事援助，那是蘇聯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卡特政府不出售武器給予蘇聯及中共的政策，仍然是正確的。據「華盛頓明星報」透露：美國所能立即供應的坦克、槍砲和地對空武器的全部數目，還不足以裝備中共一九〇個師中的一兩個師。事實上，美國所有的陸軍和海軍的地面武器，還不足以裝備半數的中共軍隊以現代化武器<sup>⑪</sup>。美國如果投下大量資本，去裝備一個不見得真正會抗蘇却可以威脅盟邦、現今就不見得是朋友

註⑩ Washington AP, Aug. 20, 1974

註⑪ 魯特瓦克 (Sward N. Luttwak) 專文「危險的中國牌」。

而將來絕對是敵人的中共，實不若自己本身充實戰力更爲省錢而明智，蘇聯也會較少受到刺激。

美國與中共建交，改變了亞洲現狀，增多了不安因素乃至軍事危機。美國如此急急與中共建交，想係唯恐中蘇兩個赤色政權言歸舊好。其實這是多餘的。目前二者實力懸殊，中共不願重返蘇聯懷抱，接受比其他附庸更加嚴厲的控制。倘若西方扶植中共將實力提高到相當程度，它不會替西方做馬前卒，而寧願在比較平等的基礎上與蘇聯緩和緊張關係，那才是它的最佳利益。到時候，西方已爲自己培養出另一個有十億人口和較強力量的敵人，要翻悔可也噬臍莫及了！

問題是蘇聯會容忍到如何程度。依蘇聯的民族性言，它可能不在言論方面作立即激烈的反應，但它對敵人的進攻絕不會不加報復，而政策一經決定，也絕少可能中途放棄。它已否認布里茲涅夫私函曾默許美國與中共建交，對它們在聯合公報中提及「霸權」一事感到憤怒<sup>⑭</sup>。且早已指摘美國正想和日本、中共搞「亞洲NATO」<sup>⑮</sup>。從其語氣看來，蘇聯極可能在軍事部署上施行反擊。這項行動可能在全球戰略上着眼，也可能着重在亞太地區。顯然，中蘇邊境、朝鮮半島、中南半島，都是容易發火的地區。亞洲自由國家與人民，必須提高警惕，團結自救。

喬治·肯楠說：「美國政壇人物的好特性，對於假定要採取友好關係的另一個政府的命運，往往過分樂觀，必然招來查驗<sup>⑯</sup>」。今天美國對中共的估計，又犯了老毛病，中共真的團結安定了嗎？美國支持一個七十五歲的鄧小平，就能保證中共今後不再動亂？美國反蘇不反共，已是一項錯誤。拉中共反蘇聯，更是錯上加錯。共產主義不會變，中共不會由於叫嚷現代化和有限度開放觀光就變成自由化，它仍是亞洲乃至世界的潛在威脅。而姑息、幻想只是戰爭的前奏曲，歷史上已屢驗不爽！

我們堅信自由世界的一切，不論政治、經濟、軍事力量，仍然超過共黨世界。雖然，少數充滿幻想和神經衰弱的政治家，用一些錯誤的言論與行動，使自由世界處於心理劣勢，但邪惡的共產主義，不會湮沒人類光明的前途。每一個自由國家、每一個自由的政治家，應該光榮無愧地對歷史作出交代。

讓我引用「日本經濟新聞」夕刊「春秋」欄的一段話作結束罷。那一欄的最後一段，是表述一個極平凡的小市民的想法。他認爲中共雖斥罵「美帝國主義是日本和中共的共同敵人」，而今天美國又和中共建交，那些艱深的理由實在讓他弄不懂。最後他說：「夢終歸是夢，還是早一點兒醒來的好」<sup>⑰</sup>！

註⑭ 路透社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廿一日莫斯科電，中央日報（同月廿二日）第二版。

註⑮ 蘇聯國防部機關報「紅星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專論，轉見「日本經濟新聞」（同月十八日）第一面。

註⑯ 史坦來·卡諾（Stanley Karnow）所作「戴着有色眼鏡看中國」一文中所引，原文載美國「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一九七三年十月號。

註⑰ 「日本經濟新聞」夕刊（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一面。